

多语种史料中的成吉思汗御极叙事

张晓慧

【摘要】丙寅(1206)建号成吉思被普遍视为铁木真御极、蒙古帝国建立的标志。建号称汗所承载的铁木真开国御极的历史意义,似乎不容质疑。但实际上,蒙古开国史的讲述方式,在蒙元时代的多语种史料中不尽相同。讲述蒙古开国史,涉及如何赋予“事件”以“意义”的问题。除了丙寅建号,铁木真在猪年(1202-1203)战胜王汗的事件,以及1180年代首次称汗的事件,都曾被时人视为开国御极的标志性事件。受到不同语言文化中历史书写传统的影响,汉文、波斯文和蒙古文史籍在讲述成吉思汗开国史时,对上述事件各有侧重。

【关键词】成吉思汗;御极;丙寅建号

【作者简介】张晓慧(1990-),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2024.1.25~3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蒙古开国史新论”(21CZS021)的阶段性成果。

1206年,铁木真在征服克烈等部族之后,基本完成了蒙古草原的统一,聚会于斡难河,建号“成吉思”。丙寅建号,历来被视为成吉思汗御极的标志性事件。不过,丙寅之外,中外史料在追溯成吉思汗崛起历程之时,对另一个时间节点格外强调。

在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主编《史集·蒙古史》部分中,有两节专门记载成吉思汗登临大位。一在猪年,即伊斯兰教历599年(相当于公元1202-1203年)。一在虎年,即伊斯兰教历602年(相当于公元1205-1206年)。前者是铁木真战胜克烈部王汗之后的称帝之年,后者是建号成吉思汗之年。对于这两个年份,拉施特本人特作一番考辨,铁木真“称帝的那年是个猪年,他的死年也是个猪年。在蒙古编

年史上,则认为他御极之年是他杀死乃蛮王太阳汗后、(群臣)向他献上成吉思汗尊号(laqab)之年”^①。在铁木真御极之年这一重大问题上,《史集》同时存在猪年与虎年两种说法。这种情况是如何造成的,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如何定义蒙古开国的时间?这一问题已经超出单纯的历史“事件”层面,涉及怎样讲述历史。即,在将“事件”纳入“叙事”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为“事件”赋予意义,来达到“宏大叙事”的目的。在这一研究思路之下,蒙元史尚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探索。例如邱轶皓重新解读成吉思汗与群臣饮班朱泥河水的故事,揭示出蒙古历史“纪元”在不同史料中,从“十三翼之战”“击败泰赤乌诸部”后移到“共饮河水”之

时。^②本文就以成吉思汗御极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中外史料对标志性事件的不同讲述方式,探讨蒙古开国“叙事”的不同生成路径。

一、“事件”与蒙古开国“叙事”

本节以大蒙古国为考察时段,探讨这一时期成书的史料,在讲述蒙古历史时,赋予哪些历史事件以蒙古开国的关键意义。

在成吉思汗的同时代人对蒙古历史和成吉思汗生平经历的讲述中,开国御极的标志性事件尚未出现。1219年《璽屋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刻录成吉思皇帝赐丘处机手诏,提到“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③。此诏虽出自汉人文臣之手,但可以反映大蒙古国的官方立场。诏中的“七载”,指的是1211年成吉思汗伐金以来。^④成吉思汗帝业的起点,既不是灭王汗后御极的猪年,也不是建号成吉思的虎年。1220年左右耶律楚材制《西征庚午元历》,“中元岁在庚午,天启宸衷,决志南伐……上元庚午岁,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夜半冬至,时加子正,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同会虚宿五度,以应我皇帝陛下受命之符也”^⑤。郭津嵩分析,庚午年(1210)的政治意义难以与战胜王汗的猪年、建号的虎年和出兵伐金的辛未年(1211)相提并论,选取庚午为历元是因为制历之法的限制。^⑥这至少说明耶律楚材制历之时,官方尚未确定成吉思汗应天受命的年份。1221年出使蒙古的南宋使节赵珙讲述“鞑主始起”,只提到成吉思汗少被金人所虏、尽知金国事宜。^⑦生活在毛夕里(Mosul)的历史学家伊本·阿昔儿(1160-1233)称,鞑靼人从乞台边境崛起之后,锋镝西指河中地区。^⑧供职于花剌子模王朝的奈撒维,亲历了蒙古人在河中地区的战争。1241年他写成《札兰丁传》,回顾成吉思汗的崛起,围绕着阿勒坦汗与成吉思汗之间的关系展开。^⑨赵珙、伊本·阿昔儿和奈撒维,都是成吉思汗的同时代人,亲历或听闻了成吉思汗的崛起与征战。他们对成吉思汗崛起历程的讲述,尽管在细

节上各有侧重,但共同点是都涉及他的崛起与金朝的关联,而并没有具体地将某一事件作为他御极的标志。

成吉思汗之后到忽必烈即位之前,时人对成吉思汗经历的表述中,有两个时间点逐渐得到重视。即本文开头提到的战胜克烈王汗的1202-1203年和建号成吉思的1206年。这两大事件开始被赋予开国御极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史料直接提及“即位”事件,还有一些史料尽管没有用“即位”一词,但是对这两大事件有着不同形式的强调。有的虽讲述了成吉思汗生平的许多故事,但以某个事件为叙事重点,点明了事件发生的时间;有的只讲述成吉思汗的一个事件,来概括他的生平经历。这些史料间接地显示出不同事件的开国意味,以下详述之。

1247年出使蒙古的教皇使节西蒙·圣宽庭,称鞑靼人在1202年杀死他们的君主,即曾经的印度君主長老约翰的儿子,随后选举成吉思汗为首领。^⑩長老约翰的传说,可能与有景教信仰的克烈部有关。与西蒙类似,另一教皇使节鲁布鲁克于1253年出使蒙古,也以战胜王汗为成吉思汗崛起之始。^⑪1245-1247年,教皇使节加宾尼出使蒙古汗廷。他称蒙古人已战斗四十二年,他们预定还要统治十八年。推算其起始时间约在1204年,其依据不明,可能因为1204年是甲子年,加宾尼对干支纪年产生了误解。^⑫13世纪60年代成书的《世界征服者史》中,有一节是关于成吉思汗兴起的简要纪事。其中讲述了伊斯兰教历599年成吉思汗与王汗进行的战争,尤其是两答剌罕告变和班朱泥河大战,成为此后波斯文史籍讲述蒙古历史的一个重要母题。这段纪事中并未出现建号成吉思之事及其年份。唯一标志着成吉思汗达到事业鼎盛的年份即是伊斯兰教历599年。此后成吉思汗经历的叙述都较为简略。^⑬成吉思汗在猪年达到事业鼎盛的说法,也能间接地找到汉文史料的踪迹。伊斯兰教历676年(相当于公元1277-

1278年)抄成的《伊利汗天文表》,提及班朱泥河之战,成吉思汗战胜了克烈部主亦剌合·鲜昆。这一年是猪年“癸亥”(gūy khāy),也是“中元”(jūng ūn)的最后一年,此后成吉思汗陆续征服了乞台和突厥诸君主。^⑭《伊利汗天文表》的相关内容,其源头应该是某种汉文书籍。拉施特在《史集·中国史》“前言”中提到,根据《伊利汗天文历表》所载乞台学者讲述的中国历史分期,从中国历史开端到成吉思汗杀死王汗、自立为王的猪年,已过去八千多万年。^⑮可见在汉文史料中,曾经存在过成吉思汗猪年开国的说法。尽管现存的汉文史料中,找不到直接以猪年为成吉思汗开国之年的说法,但是汉文史料编年记事的开始时间,与猪年御极说有一定关系。《元史》《圣武亲征录》《通鉴续编》,都以壬戌(泰和二年,1202)为编年记事的开端。^⑯这一年成吉思汗与王汗开始交恶,次年(即猪年)成吉思汗战胜王汗。而且《元史》1202-1203年间的记事,相比之后数年篇幅更长、叙述更详。

在同一时期,猪年说并不是成吉思汗御极的唯一说法。波斯史家朮兹札尼的《纳西里史话》,成书于1259-1260年,与《元朝秘史》《世界征服者史》的成书年代相近,有其独立史源。在讲述成吉思汗经历时,朮兹札尼提到的唯一一个时间点并不是伊斯兰教历599年,而是602年,这一年成吉思汗崛起于秦和桃花石之地。^⑰可见,分别以猪年和虎年为成吉思汗御极的时间,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几乎在同一时期产生。只不过并不是所有这一时期的史书都明确了成吉思汗的御极时间。稍晚于《世界征服者史》成书的《历史的秩序》(1275年成书),涉及成吉思汗经历的部分,只提到他进攻花剌子模的年份。^⑱

总之,在大蒙古国时人看来,建号成吉思并不总是铁木真生平经历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关键事件。战胜王汗的猪年和建号称汗的虎年,都曾被当作蒙古开国的时间。这两种说法几乎同时产生,在中西史

料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不过,在大蒙古国时期之后,伊利汗国和元朝史料中的成吉思汗御极叙事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下文分别加以分析。

二、波斯文史书中的猪年御极说

分别以战胜克烈部王汗和建号成吉思这两大事件为标志,蒙元时代的多语种史料围绕成吉思汗御极,形成了两种“叙事”模式。本文开头提到的《史集·蒙古史》的记载,同时体现了这两种叙事模式的影响。拉施特一方面说铁木真称帝的那年是个猪年,另一方面说其御极是在杀死乃蛮王、建号成吉思之年。后一种说法的依据是“蒙古编年史”(Tārīkh-i Mughūlī),此词在《史集·蒙古史》中仅此一见,难以判断具体所指。只能说在铁木真御极之年问题上,所谓“蒙古编年史”的记载与拉施特依据的主要史源存在差异。^⑲

通观《史集》的相关记事,拉施特兼采猪年和虎年御极说,其原因除了史源差异,还可能与编撰流程有关。^⑳由于拉施特卷入政争被杀等原因,未能完成《史集》的统稿工作,全书存在很多自相矛盾之处。根据最新的研究,《史集·成吉思汗传》的初稿可能是最早完成的。在《部族志》完成后,《成吉思汗传》又根据编撰前者时获得的资料作了增补。而《成吉思汗传》的“编年纪要”部分则晚于传记主体编成。^㉑《史集》层累的编撰过程反映在猪年和虎年御极的问题上,呈现出以下矛盾。关于猪年,《史集》将成吉思汗的一生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155-1167、1168-1194、1195-1203、1204-1210、1211-1219、1219-1227。可见1203年(猪年)具有划分时代的意义。在《史集》的一些抄本中(如伊斯坦布尔本、塔什干本),猪年登临汗位一节附有画像(或存或残),虎年建号一节则并无画像。鉴于《史集》在关键之处配有画像的一般情况,可以推测猪年的登临汗位,被视作成吉思汗事迹中较关键的情节。关于虎年,《史集》总目录中说成吉思汗在位23年,《成吉思汗纪》的

“编年纪要”也以取得成吉思尊号为界,将铁木真的主要生平经历划分为两部分,建号之前共11年,建号之后共22年。^②可能的情况是,《史集》在初撰时采用猪年御极说,在最后的增补定稿阶段参酌“蒙古编年史”增入虎年御极说。

拉施特的另一部著作《五族谱》简述成吉思汗生平如下:“征服了克烈部的君王王汗后,被称为‘成吉思’,意为‘伟大的君王’。此后当他杀死乃蛮部君王太阳汗,他的王位确立和稳固了,并立起了九旂大旗,尊号为‘成吉思汗’。”^③建号成吉思、立九旂大纛的时间,被分别放置在战胜王汗和太阳汗之时,这两大时间节点都得到强调。成书于帖木儿王朝的《贵显世系》,部分以《五族谱》为蓝本。《贵显世系》在《五族谱》成吉思汗生平简述的基础上,增加如下内容: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教历599年,即50岁时即位,在624年死于乞台边境,统治了25年。^④可见《贵显世系》只采用了成吉思汗御极于猪年的说法。

拉施特《史集·中国史》在概述成吉思汗生平时,只提到伊斯兰教历602年建号成吉思汗一事,并未提及599年铁木真战胜王汗后即位一事。^⑤《史集·中国史》的同源文献《五族谱·乞台君主世系》,也只记载铁木真于伊斯兰教历602年即位,建号成吉思汗。^⑥《史集·中国史》的史源与《史集·蒙古史》不同,来自留居波斯的中国学者提供的资料。在成吉思汗御极问题上,其与《元朝秘史》等汉文史料保持一致。

可见拉施特《史集》中的成吉思汗御极,体现了两种“叙事”模式的影响。拉施特依据的主要史料记载了猪年御极说,而虎年御极说则来自所谓“蒙古编年史”和传入伊利汗国的汉文史料。

在成吉思汗御极叙事上,《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著作,对伊利汗国及其后的波斯文史籍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些史学著作承袭了《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的主要情节,既提到猪年铁木真战胜王汗

后即位,又提到虎年建号称帝。如《瓦萨夫史》(1312年成书)提到伊斯兰教历599年成吉思汗与王汗在班朱泥河发生战事,成吉思汗获胜,宣谕诸部归顺。同时,书中也述及“癸亥”年帖卜·腾格里上尊号。^⑦又如《班那卡提史》(截止到1317年的通史)在讲述成吉思汗经历时,没有给出确切的年份,只是笼统地提到,铁木真战胜王汗后被尊为成吉思,杀死乃蛮部塔阳汗后当上了君主。^⑧托名帖木儿王朝兀鲁伯写成的《四兀鲁思史》(已佚,部分内容见《突厥系谱》与《人类个人历史的传记之友》)中,上述两大事件都有提及。^⑨莫卧儿王朝史书《阿克巴志》也是如此。^⑩

还有一些波斯史书,在伊斯兰教历599年和602年的两大事件之间,更强调和重视前者。《世系汇编》(1333年成书)只提到伊斯兰教历599年成吉思汗战胜王汗,登上王位,没有记载帖卜·腾格里上尊号一事。^⑪穆思妥菲的《武功纪》(1335年成书)对599年和603年(可能是602年之讹)两个年份都有提及,称前者是成吉思汗即位的时间,后者是帖卜·腾格里上尊号的时间。^⑫可资对比的是,同作者的《选史》(1334年成书),只记载599年铁木真战胜王汗,登上王位(没有提到班朱泥河之战)。尽管书中也提到战胜塔阳汗和建号成吉思之事,但并未记载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⑬

相对而言,猪年战胜王汗的故事,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和传播。一些波斯史书讲述猪年战胜王汗故事,比虎年上尊号要生动详细得多。这表现为,一些史书形成了高度相似的叙事模式,大致都包含“闻谋告变”“班朱泥河之战”“饮浑水”这三个关键情节,只是史书详略不一。《世界征服者史》并没有提到饮浑水之事,只是提到班朱泥河之战,反而对闻谋告变着墨颇多。《伊利汗天文表》(1278年成书)在讲述班朱泥河之战时也没有提及饮浑水之事。《蒙古纪事》(1281-1285年成书)讲述成吉思汗生平的唯一事件,就是猪年成吉思汗建立功业,君臣在班朱泥河

共享食物。^③到了《史集》中,三个情节齐备,只是对饮浑水着墨不多。

战胜克烈的故事,也是同时期其他语种史书讲述成吉思汗经历的主题。叙利亚史家把·赫卜烈思(1226-1286)对成吉思汗建国经历的记载中,惟提到伊斯兰教历599年成吉思汗战胜王汗一事,无建号成吉思一事。^④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史家乌马里,参考了《世界征服者史》的记载,讲述成吉思汗的崛起经历,也只是提到战胜王汗一事。^⑤在亚美尼亚史籍中,乞刺可思的《亚美尼亚史》(成书于13世纪60年代),在讲述成吉思汗经历时,只提到他是生活在哈刺和林的可汗的君主。^⑥稍晚成书的瓦尔旦(Vardan)所撰通史和葛里高尔(Grigor of Akanc)的《弓手国族史》,都没有成吉思汗崛起的相关情节,只是提到鞑靼人从秦等地区西侵。^⑦《东方史菁华》(1307年成书)只讲述了成吉思汗神授汗权的传说故事。^⑧上述著作都没有提到成吉思汗御极的历史事件。根据邱轶皓的研究,直到成书于14世纪的格鲁吉亚《百年纪》(1212-1318年编年史),才开始记载班朱泥河之战后,成吉思汗战胜王汗,登上王位。^⑨

总体来看,伊利汗国的波斯文史籍,和其他蒙元时代的多语史料,在战胜王汗和建号这两大具有御极意义的事件之间,对前者更加强调。这与元代汉文史料呈现的面貌有着很大的差异。

三、元代史料中丙寅建号说的流行

元代汉文史料,以丙寅建号说为主流。与成吉思汗生平经历中的其他关键时间节点相比,丙寅建号说如何通过“叙事的竞争”成为主流,这是本节关心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大蒙古国时期,人们讲述成吉思汗的事迹之时,往往都会提及征讨金朝的情节。根据曹金成的研究,到中统初年(1260-1261),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仍重申耶律楚材的“庚午受命”说:“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数百里。次年庚午,我太祖皇帝

经略中原……河清之征,太祖皇帝受命之符也。”^⑩中原士人对征金事件的重视,来源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视角。不过,前述成吉思汗同时代的伊本·阿昔儿和奈撒维,均提及蒙金战事。这显示出无论东西,在蒙古锋镞所到之处,时人都将征金视作成吉思汗崛起的关键时间节点。

蒙古人自身怎样讲述成吉思汗的生平经历?《元朝秘史》成书于大蒙古国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立场。《秘史》第202节记载虎儿年(1206)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建九旂白纛称汗,大封开国功臣。^⑪在《秘史》撰写者的眼中,这是否标志着成吉思汗御极呢?

早在《秘史》第123节中,就已经记载道,在铁木真与札木合交恶,众人归附铁木真麾下之后,阿勒坛等人拥立铁木真为汗。值得注意的是,《秘史》将建号成吉思的时间提前至此。^⑫并且以第123节为界,《秘史》对成吉思汗的称呼呈现出明显不同的体例。第123节之前,《秘史》直呼其名铁木真。123节之后,《秘史》一律称其尊号成吉思汗,只有在记述别人的对话时才照录铁木真一名。这表明《秘史》的撰写者通过体例的区别,刻意强调铁木真第一次称汗之时就已建号成吉思。当然,《秘史》也在202节记载成吉思再次即位,成为有毡帐的百姓之汗。不过,相比于其他史料仅强调丙寅建号,《秘史》反而对铁木真第一次称汗一事颇有偏重。

《秘史》的记载,尽管与《史集》《元史》等其他史料大相径庭,但是能够反映时人对成吉思汗御极的一种独特看法。沈曾植等学者已注意到,《重修文殊寺碑》汉文部分(1326)记载“成吉思汗皇帝,即位之年,降生察合歹”^⑬。察合台之弟窝阔台的生年有确切记载,可据以推测这次称汗应在1186年前。可资佐证的是,马可波罗一行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汗廷,与《秘史》的修撰时间相去不远,马可波罗提到:“1187年时,鞑靼人推选一大勇大智大有手腕之人

王,其名曰成吉思汗。”^⑤马可波罗提示的这一时间,与《秘史》所载铁木真第一次称汗的时间颇为相近。这显示出成吉思汗首次称汗的故事,并不仅限于汗廷史乘。到了明清时期,蒙古文史籍《蒙古源流》和《阿萨喇黑齐史》,都继承了《秘史》将建号成吉思提前做法,没有丙寅建号的记载。不仅如此,两书还增添了即位的具体时间,分别是己酉年(1189)和水虎年(1182)。^⑥上述诸说,虽然具体年份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记载铁木真称汗在1180年代。马可波罗和明清蒙古史籍所记时间,可能是对铁木真第一次称汗时间的不同讹记。

以《秘史》为代表的1180年代建国的记载,尽管与铁木真建号的史实并不相符,但通过将称汗建号的时间提前,突显了成吉思汗早早统帅诸部的天命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秘史》等史料的记载,反映出蒙古人自身对统治合法性的独特理解。邱铁皓的研究指出,蒙古人是在击败花剌子模之后,产生出全新的天命征服世界的观念。^⑦而蒙古人眼中成吉思汗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依照《秘史》等史料反映的情况来看,既不是战胜克烈和金朝,也不是击败花剌子模之后的世界征服,而是首次称汗和建立汗号(提前至首次称汗之时)。第二次(丙寅年)即位称汗,则是因为平定了有毡帐的百姓,扩大了蒙古政治集团的范围。

称汗建号被视作统治合法性的来源,这一传统在元代汉文史料中延续下来。不同之处在于,元人保留了对建号成吉思的重视,但没有将建号与首次称汗挂钩。《圣武亲征录》等史料未记阿勒坛等上尊号成吉思汗事,只强调丙寅年建号成吉思。^⑧元文宗命修《经世大典》,将帝号放在开篇的位置,“君临天下,名号最重,作帝号第一”,“至我太祖皇帝,而大命彰,大号著,大位正矣。于是东征西伐,莫敢不庭,大王小侯,稽首奉命”^⑨。这些记载体现出天命之下建号正位,然后征服世界的逻辑,统治合法性并非来源于征服。在元代的汉文史料中,丙寅建号事件逐渐

固化为成吉思汗御极的标志,得到广泛的传播。如称太祖皇帝“肇启土宇,建帝号”“方尊位号,始定教条”^⑩,类似的看法成为时人的普遍认知。

元代修撰实录,开始采用汉式的皇帝纪元,追述祖宗事迹。根据成吉思汗同时代人的观察,当时的大蒙古国尚未采用成吉思汗纪元。《蒙鞑备录》记载:“珙每见其所行文字,犹曰大朝,又称年号曰兔儿年、龙儿年,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今日辛巳年是也。”^⑪《黑鞑事略》称:“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如子曰鼠儿年之类。今用六甲轮流,如曰甲子正月一日或卅日,皆汉人、契丹、女真教之。若鞑之本俗,初不理睬得,但是草青则为一年,新月初生则为一月。人问其庚甲若干,则倒指而数几青草。”^⑫上述情况反映在《元朝秘史》当中,《秘史》采取的是十二生肖纪年。与之类似,《史集》也采用生肖纪年(同时还有伊斯兰教历纪年)。《圣武亲征录》采用的是干支纪年。由此可见,大蒙古国时期普遍采用生肖和干支纪年。太祖纪元的采用,应源自入元之后人们对成吉思汗时代的追溯。由于成吉思汗的早年经历缺乏编年记录,首次称汗的时间在元代修撰国史时已难以确知。丙寅建号则在史籍中班班可考,可作太祖纪元之始。《通鉴续编》中已经开始采用太祖纪元,纪元的起点正是丙寅建号。《通鉴续编》虽为元末南人陈桱编修,但书中有不少独家史料,很可能来自元廷流出的《实录》。^⑬这反映出元修《太祖实录》对太祖建号纪元的采用。元代文献中,常见太祖某年、太祖建帝号之某年、太祖皇帝正大位之某年这样的表述。在这些表述中,纪元的起点都是建号成吉思的丙寅年。太祖纪元的采用,强化了丙寅年的开国御极意义。可资对比的是,波斯文历表中也曾出现一种成吉思汗纪元,以1203年为元年,是以铁木真战胜王汗之后的年份,而不是以建号成吉思的年份为起点。^⑭

铁木真战胜王汗的事件,在元人的讲述中,一般

并不具有标志成吉思汗御极的特殊意义。时人或将征服克烈一事与征服乃蛮、西夏、金源、西域等并称,^⑤或称“王可罕败走死,诸部以次服”^⑥,将征服克烈作为平定诸部中最重要的一环。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讲述,1200年成吉思汗与长老约翰(指王汗)交恶,发生大战,成吉思汗战胜,逐渐占领其全境。^⑦1200年的传闻,可能是成吉思汗和王汗之间战事的一种讹说。无论如何,其重要性与丙寅建号不可同日而语。

成吉思汗生平经历的讲述,与统治合法性的塑造息息相关。蒙古帝国的建立与扩张依赖于军事征服,但是按照塑造统治合法性的逻辑,军事征服是天授汗权的结果。正如《经世大典》所云,先“著号”“正位”,后东征西伐。称汗和建号,得以从战胜克烈、讨伐金朝、灭花剌子模乃至征服世界等一系列事件中“胜出”,成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

四、总结

开国史如何讲述,这是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政权普遍需要面对的问题。与蒙元类似,辽金也是入主中原的北族政权。在辽金开国史问题上,苗润博揭示辽朝本来明确的开国年代遭到了史官的全面改写,形成了常见的907年建国说,这根源于王朝汉化渐深以后对正统性、合法性的强烈诉求;^⑧邱靖嘉认为阿骨打于1117年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辅”,《金史》所记1115年建国说乃是出于金修《太祖实录》时的系统性建构。^⑨上述认识都暗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开国年代本来是明确清晰的,只是经历了后世的改写。本文表明,史事的改写在蒙元时代同样存在,例如《秘史》对建号时间的改写。但是,发生在改写之前的是,首先得为“开国”做出定义。“开国”本身并不是确定不易的事件,而是具有政治意味的叙事。事件并不天然地具有意义,关键在于如何为事件赋予意义。大蒙古国建立之前,北方草原长期以来诸部并立,未形成统一的政权观念和族群认同。铁木真在崛起之初

被拥立为汗,克烈部王汗表示赞许:“您达达每若无皇帝呵,如何过?”^⑩可见此时铁木真作为蒙古之汗,仅局限于若干部族范围之内,并不包括以王汗为首的克烈部等后来被视为蒙古的诸部族。随着铁木真的东征西讨,越来越多的草原部族被纳入蒙古旗帜之下。在蒙古扩张的过程中,统治者并未有意识地通过某一具体的“开国”事件来获取政治合法性。在成吉思汗开启征服世界的进程之后,不同地域出身、文化背景和政治立场的人们,对蒙古开国有着不同的看法和选择,基于不同心态的叙事因而产生。围绕着如何讲述成吉思汗御极,不同的历史事件形成了“叙事的竞争”。在成吉思汗同时代人的意识中,成吉思汗御极的标志性事件尚未出现。在成吉思汗时代之后,如何选择那些有“意义”的事件,来完整地讲述这位世界征服者的生平故事,成为蒙古历史的讲述者们面临的问题。以《元朝秘史》为代表的铁木真首次称汗说,以及分别以战胜王汗、建号成吉思这两个事件为标志的猪年御极和虎年御极说等不同说法在蒙古社会中产生。上述说法在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中,呈现不同的流行程度。猪年战胜王汗而即位的叙事,先后为《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所记录。由于《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对波斯文历史写作的巨大影响,尽管虎年建号说亦有记载,但相对而言猪年说在伊利汗国的史籍中间更加流行。从正统性的角度来理解,相比于战胜王汗,称汗和建号的象征意义不在于政权从何人何处夺取,“成吉思”的称号显示了强大汗权的普适性,更符合“正名”的政治习惯。^⑪《秘史》中首次称汗、建号成吉思的说法,反映了蒙古官方立场,并为明清蒙古史籍继承。铁木真首次称汗即建号成吉思的说法,当然并不符合史实。其作用在于,通过将建号时间提前,巩固成吉思汗长期以来就是蒙古诸部统治者的正统地位,这体现出称汗建号对构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意义。

丙寅建号与太祖纪元相结合,成为汉文史料中元人对蒙古开国史的普遍认识。蒙古开国史的书写,经历了选择、流传、改写、定型的复杂过程。

本文的写作得到张帆、邱轶皓、曹金成的指导,谨致谢忱!

注释:

①[波斯]拉施特(Rashīd al-Dīn)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2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02-203、227-228、379页。

②邱轶皓:《如何“进入”蒙古历史——两则与“共饮班朱泥河水”相并行的故事及其传播》,《文史》2019年第3辑。

③陈垣编纂,陈志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45页;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15页,“大业”作“帝业”;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8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页。诏书录文见[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〇“丘真人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0页,与碑字句有所不同。

④韩儒林认为“七载”指1200年消灭塔塔儿部以后,见《元史讲座》,北京,北京出版社,2020年,第21页。感谢李鸣飞惠示。

⑤[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八《进西征庚午元历表》,《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5、16页。感谢邱轶皓惠示。

⑥郭津嵩:《撒马尔干的中国历法:耶律楚材的“西征庚午元历”及其“里差”法考辨》,《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1期。

⑦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3页。

⑧Ibn al-Athīr, The Chronicle of Ibn al-Athīr for the Crusading Period from al-Kāmil fī'l-tārīkh, Part 3: The Years 589-629/1193-1231, The Ayyūbids after Saladin and the Mongol Menace, D. S. Richards trans.,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08, pp. 204-205.

⑨Mohammed en-Nesawi, Histoire du Sultan Djelal ed-Din Mankobirti, Prince du Kharezm, traduit de l'arabe par O. Houdas, Paris: Ernest Leroux, Éditeur, 1895, pp. 7-10. 伊本·阿昔儿和奈撒维的记载,为马穆鲁克历史学家诺外利所吸收,参见Anna Katharina Angermann, Das Unfassbare fassen und zu Geschichte formen: An-Nuwayrī's *Dikr aḥbār ad-dawla al-ḡinkizhānīya*, Inaugural-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r Doktorwürde d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 der Universität Bonn, 2020, p. 159.

⑩Jean Richard, Au-delà de la Perse et de l'Arménie: l'Orient latin et la découverte de l'Asie intérieure: quelques textes inégalement connus aux origines de l'alliance entre Francs et Mongols, 1145-1262, Brepols, 2005, p. 83. [法]西蒙·圣宽庭原著,让·里夏尔(Jean Richard)法译、注释,张晓慧汉译,周思成校:《鞑靼史》,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46页。

⑪[英]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41页。

⑫[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第25页。

⑬[波斯]志费尼(Ala' al-Dīn Juvaynī)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5-38页。

⑭John Andrew Boyle, "The longer introduction to the Zīj-i Ilkhānī of Nasir al-Dīn Tusi", 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 1963: 8, p. 250.

⑮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邱轶皓惠示,《瓦萨夫史》中亦有这段记载,所记年份更为准确。

⑯《元史》卷一《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页;贾敬颜校注,陈晓伟整理:《圣武亲征录(新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84-98页;[元]陈桱:《通鉴续编》卷一九,日本内阁文库藏元刻本,第22页。

⑰Juzjani, Tabakat-i-Nasiri: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 tr. by H. G. Raverty,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81, vol. 2, p. 935.

⑱'Abd Allāh ibn 'Umar Bayzāwī, Niẓām al-tawārīkh, ed.

by Muhammad Afshūr, digitalized by www. Ghaemiyeh. com, p. 107.

①《史集》抄本众多,“伊朗国民议会本”和“伊斯坦布尔本”是两个独立的抄本系统。“议会本”可能来自于拉施特后人保存的初稿,而“伊斯坦布尔本”中则插入了可能非拉施特本人所作异文。参见 Stefan Kamola, *Making Mongol History Rashid al-Din and the Jami‘ al-Tawarikh*,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38. C. P. Atwood, "Rashid al-Din's Ghazanid Chronicle and Its Mongolian Sources", Timothy May, *Dashdondog Bayarsaikhan*, Christopher P. Atwood (eds.), *New Approaches to Ilkhanid History*, Leiden: Brill, 2021, pp. 53-62. 猪年和虎年登基这两节,均包含在两个抄本系统中。但《史集》的早期阿拉伯语译本(Ayasofya 3034)中,《部族志》部分并无虎年登基的内容,这反映了拉施特草稿本的面貌。感谢邱轶皓惠示。

②邱轶皓:《帖卜·腾格里所传神谕考》,《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第4期。邵循正、周清澍则认为拉施特的记述受到星占学说的影响,见邵循正《成吉思汗生年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③邱轶皓:《帖卜·腾格里所传神谕考》,第57-59页。

④[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98页;第1卷第2分册,第347-380页。

⑤Shu‘ab - i panjgāna, Istanbul: Topkapı - Sarayı Müzesi Kütüphanesi, f. 105b. (此为北京大学《五族谱》读书班共同研读成果)

⑥Mu‘izz al - Ansūb,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Persan 67, f. 13b.

⑦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第178页。

⑧Shu‘ab - i panjgāna, f. 227b.

⑨Shihāb al - Dīn ‘Abd Allāh Sharaf Shīrāzī, *Tārīkh - i Vasāf al - Ḥazrat*, vol. 4, ed. by Alī Rizā Ḥājyān Nijād, Tehran: Intishārāt - i Dānishgāh - i Tihārān, 2009, pp. 377-378. 参见邱轶皓《帖卜·腾格里所传神谕考》,第67-72页。

⑩Dāvūd ibn Muḥammad Banākātī, *Tārīkh - i Banākātī*, ed. by Ja‘far Shi‘ār, Tihārān, Tihārān: Intishārāt - i Anjuman - i

Āsār - i Milli, 1969, p. 363.

⑪The *Shajrat ul Atrak*: Or the Genealogical Tree of the Turks and Tatars, translated and abridged by Miles, London: Allen, 1838, pp. 69-72; Khwandamir, *Habibū’s - Siyar*, Tome Three, *The Reign of Mongol and the Turk*,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 M. Thackst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pp. 11-12.

⑫Abūl - Fazl Mubārak, *Akbar Nāma*, Tihārān: Anjuman - i āsūr va Mafākhir - i Farhangī, 1966, p. 118. 此条史料系邱轶皓提示,谨致谢忱。

⑬Muḥammad ibn ‘Alī ibn Muḥammad Shabānkārā‘ī, *Majma‘ al - Ansūb*, ed. by Mīr Hāshim Muḥaddīṣ, Tihārān: Amīr Kabīr, 1984, p. 228.

⑭Ḥ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 *Zafarnāma*, Fātima ‘Alāqa (ed.), Tihārān: Pazhuhishgāh - i ‘Ulūm - i Insānī va Mutālī‘āt - i Farhangī, 2011, v. 7, p. 163, 185.

⑮Ḥ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 *Tārīkh - i Guzīda*, ed. by ‘Abd al - Ḥusayn Navāyī, Tihārān: Amīr Kabīr, 1960, p. 581.

⑯Maḥmūd ibn Mas‘ūd Quṭb al - Shīrāzī, *Akhbār - i Mughlān dar anbāna - yi Mullā Quṭb*, ed. by Īraj Afshūr, Qum: Kitābkhāna - yi Buzurg - i Hazrat Āyat Allāh al - ‘Uṣmā Mar‘ashī Najafī, 2009, pp. 19-21. 参见邱轶皓《帖卜·腾格里所传神谕考》,第65页。

⑰Bar Hebraeus, *The chronography of Gregory* (Ab 21 Faraj the son of Aaron the Hebrew physician commonly known as Bar Hebraeus being the first part of his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orld), translated by Ernest W. Wallis Budge, Gorgias Press, 2003, p. 352.

⑱Klaus Lech, *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 Al - ‘Umārī’s Darstellung der Mongolischen Reiche in seinem Werk *Masālik al - abṣār fī mamālik al - amṣā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8, p. 94.

⑲Kirakos Gandzaketsi, *History of the Armenians*, tr. by Robert Bedrosian, New York, 1986, Chapter 20, p. 68. (非正式出版)

⑳M. éd. Dulaurier, *Les mongols d’après les historiens arméniens*; extrait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de Vartan,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8, p. 197; 札奇斯钦译:《弓手国族(蒙

古)史》,收入《辽金元史研究论集》,台北,大陆杂志社,1970年,第287页。

③Hetum, History of the Tartars (The Flower of Histories of the East), tr. by Robert Bedrosian, New Jersey, 2004, Chapter 16, pp. 24–25. (非正式出版)

④The Georgian Chronicles of Kartlis Cxovreba: A History of Georgia, Stephen Jones (ed.), Artanuji Publishing, 2014, p. 319. 参见邱轶皓《如何“进入”蒙古历史——两则与“共饮班朱泥河水”相并行的故事及其传播》,第238页。

⑤[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取和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6页。类似说法亦见卷一《龙和宫赋》,第371页。参见曹金成《元朝德运问题发微:以水德说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3期。

⑥乌兰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56–258页。

⑦乌兰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第104页。

⑧沈曾植:《元秘史补注》卷四,《民国丛书》第5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3页;贾敬颜、洪俊:《关于成吉思汗历史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3期;余大钧:《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6页。不过,《重修文殊寺碑》的回鹘文部分仅记载成吉思汗生察合台,并未提及即位之事,见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感谢曹金成惠示。

⑨[意]马可波罗(Marco Polo)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

⑩乌兰:《〈蒙古源流〉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50、192–193页。不过,蒙古史籍中也存在丙寅建号的记载。见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⑪邱轶皓:《帖卜·腾格里所传神谕考》,第62页。

⑫[元]佚名著,贾敬颜校注,陈晓伟整理:《圣武亲征录(新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88页。

⑬[元]赵世延、[元]虞集等撰,周少川、魏训田、谢辉辑校:《经世大典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总序》,第2

页;《第一帝号》,第1页。

⑭[元]余阙:《青阳集》卷九《元统癸酉廷对策》,《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4页;《元史》附录《进元史表》,第4673页。

⑮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王国维遗书》第13册,第4页。

⑯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第13册,第7页。

⑰[元]陈桱:《通鉴续编》卷一九,第21页。《通鉴续编》的史源,参见黄时鉴《〈通鉴续编〉蒙古史料考索》,《黄时鉴文集I大漠孤烟》,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33–156页;曹金成《史事与史源:〈通鉴续编〉中的蒙元王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21页。

⑱S. H. Taqizadeh, "Various Eras and Calendars Used in the Countries of Isla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1939: 4, p. 118. 文中提到了伊斯兰历表中的另一种成吉思汗纪元,以1206年为元年,显然受到了元代丙寅建号说的影响。见元末永昌府写就的Sanjufini《天文表》(Herbert Franke, "Mittelmongolische Glossen in einer arabischen astronomischen Handschrift von 1366", Oriens, 1988: 31, pp. 95–118)。

⑲[元]苏天爵编,张金铤校点:《元文类》卷二三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28页;[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一《鹤年吟稿序》,《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页;等等。

⑳[元]苏天爵编,张金铤校点:《元文类》卷二四元明善《丞相东平忠献王碑》,第444页。

㉑[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37–145页。

㉒苗润博:《被改写的政治时间:再论契丹开国年代问题》,《文史哲》2019年第6期。

㉓邱靖嘉:《改写与重塑:再论金朝开国年代及其相关问题》,《文史哲》2022年第2期。

㉔乌兰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第107页。“达达”是“忙豁勒”的汉译,即蒙古。

㉕“成吉思”的含义,参见白玉冬《成吉思汗称号的释音释义》,《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